宁波地名谭

杨梅的故事，藏在宁波的地名里

杨梅山、杨梅潭、杨梅岭……

余姚河姆渡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徐雪英

梅雨季，宁波烟雨绕城，山水染墨，新荷摇翠，深木流碧，引用一位北方朋友的话，到了江南城市最诗意的时节。更令人高兴的是，在滴滴雨声中，杨梅红了，吃杨梅的季节到了。

一

杨梅是长江以南非常流行的季节水果。宁波河姆渡考古遗址发现，7000多年前，余姚一带已有杨梅原种存在。约在2000多年前，先人开始栽培和驯化野生杨梅，浙江、江苏、福建、江西、湖南、广州等南方地区成为杨梅主要栽培区。其名称来历，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因“其形如水扬子，而味似梅，故名”。

在各地长期驯化培育下，杨梅形成了丰富的品种和品系。上世纪90年代，有人做过统计，当时我国栽培杨梅品种已有三百多种，品系一百多个。和很多南方城市一样，宁波杨梅资源丰富多彩，有乌种、红种、粉红种、白种等多类品种，并分荸荠种、水晶种、凤欢种、荔枝种、湖南种、早大种、迟大种等众多品系。除中心城区外，几乎每个区县（市）都有特色口味和代表产品。尤其是余姚、慈溪两地，不但杨梅栽种历史久远，品质风味更佳，被誉为浙东“杨梅之地”。

二

余姚三七市镇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荸荠种杨梅发源地。《宁波市场大观》记载，1883年，姚东三七市农民李国瑞发现荸荠种杨梅树种，1884年，二六市农民李家瑞嫁接成功。此后，荸荠种杨梅走出余姚，走出宁波，走向中国更广阔的山峦腹地。因为果实形大，色泽乌亮，核小汁多，味甜爽口，荸荠种杨梅后来成为宁波等地区最受欢迎的杨梅之一。

杨梅红了

除杨梅有名外，三七市镇的史前文化更为出名。境内有田螺山遗址，属河姆渡文化遗址一部分，其多层次的干栏式建筑及埠头、独木桥等遗迹对河姆渡文化聚落研究具有关键价值。三七市镇又发现井头山贝丘遗址，不但将宁波地区人类活动史和文明史前推到距今8000年前，还对我国海洋文化发源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和三七市类似，既有优质荸荠种杨梅，又有深厚史前文化底蕴的还有余姚丈亭、河姆渡两地，三七市、丈亭、河姆渡和穴湖一起并称为余姚四大荸荠种杨梅基地。

丈亭地处姚江平原和北部丘陵相交处，余姚江东流至此，分为慈江、姚江二流。宋宝庆《四明志》记，其分流处有石矶十七八丈，筑方丈亭其上，旧曰丈亭。丈亭境内有鲻山遗址，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文化，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的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成的小石器，多有明显的敲击和琢磨痕迹，证实河姆渡文化时期先人已在大量使用燧石打制石器，极大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

河姆渡以姚江渡口而名。作为宁波母亲河之一，姚江历经了数千年的历史风华，孕育了深厚的文化遗存。两岸曾出现过大量渡口，如姜家渡、丈亭渡、车厩渡、城山渡、鹳浦渡、邵家渡、青林渡、桃花渡等。虽然这些古渡现已基本消失，但其名称不少作为地名留存至今，河姆渡便为其中之一。

河姆渡旧称黄墓渡。光绪《慈溪县志》记，清朝有方钦华曾作《黄墓渡碑记》，云：“吾邑前江之水，由丈亭历西渡直抵郡城之北，其间之以渡名者凡九，而黄墓渡居其一。黄公者，汉四皓黄公之墓在焉”。《芦山寺志》则进一步解释“黄墓渡”演变成“河姆渡”的原因：“黄墓渡，俗讹河姆”。不过黄墓的主人到底是不是商山四皓的那位黄公，历有争议。

作为中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代表之一，河姆渡向世界勾勒了7000年前浙东原始聚落的风情风貌，也用杨梅、茭白、茶叶等现代优质栽培作物向世人展示了文明在这块土地上的传承和延续。所以吃余姚杨梅，有时候会觉得吃的不仅仅是杨梅，还有文化余香。

三

穴湖位于余姚凤山街道，以湖得名。光绪《余姚县志》引先人文献云：“吴时望气者凿断此山，故以名湖。”今湖已改建成水库。主产稻谷，并有杨梅。

史料显示，晚唐五代时，慈溪窑场附近山地已有杨梅种植，大致范围在今观海卫杜岙一带。杜岙地处里山，又临杜湖，土壤环境尤适合杨梅生长，至今仍为慈溪优质杨梅生长之地。明代，慈溪杨梅已颇有盛名。明代礼部尚书龙南人孙陞留诗为证：“旧里杨梅绚紫霞，烛湖佳品更堪夸。自从名系金闺籍，每岁尝时不在家。”孙尚书提到的“烛湖”杨梅就是现在的慈溪龙南杨梅。和杜岙一样，龙南至今也仍是慈溪优质杨梅重点产地。

除余姚、慈溪外，宁波其他区县（市）也普遍种植杨梅，不少也自成特色。如奉化以“楼隘杨梅”为传统特产，主要产地集中于莼湖楼隘、朱家店、岙口、黄檗、后琅、王夹岙一带。海曙以“东魁杨梅”为特色产品，鄞江梅园出产的“东魁”曾获浙江首届杨梅评比精品奖。

作为杨梅产销重地，宁波还有不少以杨梅命名的地名，记录着这方土地和杨梅的不解之缘。

如奉化大堰镇有杨梅山，以村周围山上多植杨梅树而名。

如余姚三七市镇有杨梅树下，以村内旧有大杨梅树而名。牟山镇有嵋山，以村南有山形似杨梅而名杨梅山，上世纪五十年代易为今名。余姚梨洲街道有杨梅潭，传三百年前为严、梅两姓居地，因在村内挖掘相连两个水潭，故原名严梅潭，后雅为杨梅潭。

又如宁海梅林街道有杨梅岭，以村处杨梅岭南麓而名。该村原仅数户居民，1958年建杨梅岭水库时，溪下吴村村民迁入，遂发展成目前规模。胡陈街道有梅山，别称杨梅山头。传蒋姓于明末清初由天台迁入。初居上蒋基，四面环山，多梅树，因称梅山。后下迁，广种杨梅，遂改称杨梅山头。蒋姓后裔怀念先祖，又复称梅山。明代该村设有杨梅山台，由胡陈汛管辖。

胡陈、梅林等宁海辖区内杨梅昔日多在西店集散，因此宁海杨梅亦统称“西店杨梅”；又因以西店桶盘山为产地代表，故也称“桶盘山杨梅”。

毛泽东论慈北农民运动

读史

俞 跃

王家谟（1906-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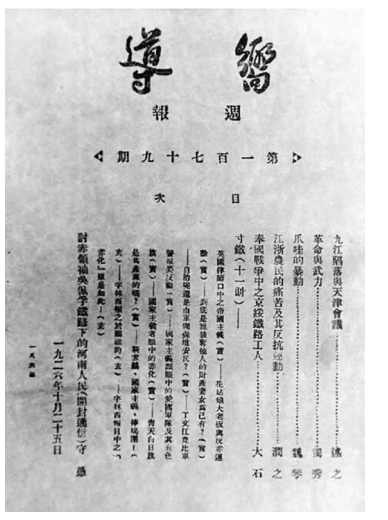
1926年毛泽东曾写下“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的宏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于是有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是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对湖南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做了实地考察后写就的。

在对农民运动开展最为热烈的湖南进行调查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对江浙一带的农民运动做了全方位的考察。他通过对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泰兴、泰县、徐州、慈溪等地的实地深入调查，记述以上各县发生的农民运动具体事实，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以“润之”署名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1926年11月）的文章。在这篇3000字左右文章中，毛泽东不认为富庶之地的江浙，没有开展农民运动的条件。相反，在他看来，江浙农民运动有其发生的必然性，更要注意吸取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所关注的发生在慈溪北部的农民闹荒暴动，首先是与当地长期以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有关。比如慈溪北部的鹤鸣、观城等地，长期以来，近60%的农民所占土地和2%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大致相同，而农民租地要向地主付出每亩15元至20元（相当于年收货量的1倍至2倍）的定金，还要交下一年每亩7元左右的预租，不管外在条件怎么变化，租金都不能少。

1926年，慈北一带发生了历史罕见的严重水灾，从黄梅到白露，连发了四次大水。靠天吃饭的农民受到了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稻谷、棉花都没有收成，2000余名受灾的农民不仅受到地主的无情压榨，还有警察的无理压迫，积怨越来越深。当年9月，慈北农民到警察署报荒，本想申冤，却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深受压迫的农民缴下警察的枪械，烧毁警察署房屋，还冲到地主劣绅家“吃大户”，发泄怨气，农民的闹荒暴动由此爆发。因县公署派大批军警下乡，抓捕了4位农民，暴动被镇压了下去。

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对农民表达同情之时，详细概述了暴动爆发原因。从主观上看，慈北农民有革命热情，受压迫的农民有起来斗争的强烈意愿。这就需要将农民革命的热情点燃、激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但如何点燃、激发农民的革命情绪，是党急需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开展革命的基础。从客观上看，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警察压迫、地主剥削等因素，激化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主客观因素的叠加，使农民运动的爆发有了必然性。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但毛泽东更关心早期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他分析，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是，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虽然这是一次原始的暴动，但其失败的教训仍然需要吸取。农民没有组织起来，群众和相应的组织缺乏思想和组织上的指导，加上反动势力的镇压，多种因素使得早期的农民运动没能取得成功。

事实上，慈溪北部农村激烈的阶级矛盾，早就为我党所关注。暴动前一个月（1926年8月），中共宁波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组织委员王家谟（后为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代理省委书记）到福山阮家、沈师桥等慈北地区考察。在获悉慈北发生农民暴动后，中共宁波地委立即召开了非常会议，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王家谟赶往慈北指导斗争，但最终还是因为错失时机，没有找到农民领抽，导致了暴动失败。

慈北闹荒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为中共宁波地方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正如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提到，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正确方针、策略，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是不可能顺利开展的。

早在1925年7月上旬，宁波鄞东邱隘一带两个村就成立了农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宁波地区最早的农会。除了农会组织的建立，党还必须要弄清指导思想等更为根本的问题。可以说，《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的一些初步想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到了更为集中与深刻的回答。比如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农民组织在农会之下，一切权力归农会组织，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推翻乡村的封建统治，要建立起农村的革命武装等。

这些思想不仅使毛泽东和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也成为后来党领导农民斗争的指导思想。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哲学博士）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

学问要有生死感

新 知

张文木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拿做学问来说，没到生死存亡时，大家治学靠的是逻辑。大家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一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推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议中间再放一个馒头，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逻辑和斯文了，而是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

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些模型和数据，一套一套的，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说广义的呢？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的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被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一想基本上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今天爱人给你打电话，说孩子找不着了。你能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

学问一定要“近及诸身”，即涉我，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谈何学问？姑娘家，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记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一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扑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姑娘做了母亲就不一样，孩子一哭，就要为孩子找粮食、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菜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好学问是把学问变成改变世界的刀子，不好的学问是把改变世界的刀子变成无问西东的“学问”。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爱情高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一到生死关头，马上就不一样。饿肚子时，这面放一把玫瑰，那面放一把枪，中间放一个馒头，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一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漫画角

孝

于海林 绘